

中国近代史学 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1902—1949)

ZHONGGUO JINDAI SHIXUE LILUN DE
XINGCHENG YU YANJIN

叶 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学 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1902—1949)

ZHONGGUO JINDAI SHIXUE LILUN DE
XINGCHENG YU YANJIN

叶 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1902 ~ 1949 / 叶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227 - 4

I. ①中… II. ①叶… III. ①史学理论—研究—中国—1902 ~ 1949
IV. ①K09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7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崔冬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其泰

近些年来，关于不同学科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考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而，可以不断见到诸如古典文学研究史、法制史发展史、文献学史、党史学史、简帛学研究史，以及研究的范围更为具体的，如红楼梦研究史、鲁迅研究史、尚书学史、春秋学史、中国孟学史等专著的出版，或者是相关研究课题的立项。我想，这一景象是研究工作更为深入、学术探讨达到更高层次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学术史研究而论，大概要经历两个层次。前一阶段，基本上是属于个案或专题式研究，如对名著、名家、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以此为基础，积累得多了，才能进入到后一阶段，即对一个学科从形成到发展，对其演进脉络、阶段特点、发展规律、经验教训等，作历史纵贯式的、系统的探讨和总结。或者说，前者是学科史研究的“自在阶段”，后者才是学科史研究的“自觉阶段”。黑格尔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从更高的层次，作历史纵贯式的系统研究的意义很有帮助，值得在此引用。他说：“‘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①虽然黑格尔讲的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但我们借此来说明学术史的研究达到了系统的研究，以历史纵贯的眼光进行综合、分析和总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结某一学科的成长史的价值，还是大有启发和益处的。研究工作上升到“自觉的阶段”，方能更深入地剖析某一学科演进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关系，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更加中肯地评判其得失，从而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启示。——我想，这应是近些年来诸多撰写学科生成发展史的著作蔚成风气的原因所在。

叶建博士的这部专著《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1902—1949》，堪称是闻其风而起者。作者撰著的缘起是，他在硕士生阶段，在导师张越教授指导下，以《20 世纪前半期史学概论著述的研究与撰述》作为学位论文题目。考取博士生后，我了解到这一情况，觉得原先做的这个题目很有创新性，大有拓展的空间和作更加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因而鼓励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把探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近代史学理论学科领域，理清不同风格和学派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评价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下决心进一步作纵贯式的系统清理。叶建在选定了这一题目之后，用三年时间从事这一难度很大的工作，其艰苦可想而知。他确实做到起早贪黑，冥思苦想，寝馈于斯，其刻苦用功的精神，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喜人的收获，叶建完成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会上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毕业后三年以来，他又进一步作认真的补充、修改，因而今天才能将这部内容翔实系统、创新见解突出的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我阅读之后感到本书优点甚多，这里我只能提出三点最突出的感受：

一是资料详备，立论有据。“近代”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有关史学理论的论著不胜其丰富，但极其分散，许多论著难得睹其真颜。叶建以“竭泽而渔”勉励自己，千方百计，逐一费力寻觅。尤为难得的是，作者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与当时期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学术期刊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颇大，其登载的史学理论或历史理论研究文章不仅能够代表当时某一问题的研究水平，而且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著述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如何阐述研究文章与理论著述之间的关系，梳理和分辨出哪些是理论著述的作者们自身的理论创新，哪些是他们在综合和提炼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是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一篇观点新颖的论文，其价值绝不低于一本见解平平的著作。然而，有的数十年前的期刊，往往要多方打听才能得到线索，而现

有的《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和《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又载录不全、多有遗漏，作者不畏艰难，尽力追寻，因而材料的占有很充分，其论述即建立在此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

二是提纲挈领，脉络清晰。纵观近代史学理论的演进，问题复杂，头绪纷繁，不同的观点相碰撞，不同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相交织。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和演进历程，作者下了苦工夫分析、比较、归纳，终于做到在一定理论高度上予以驾驭，梳理出其演进脉络。书中勾勒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02—191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直接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萌芽，梁启超等人又对此进行初步探索，使得史学建设终于迈出自身的第一步。1916—1939年为第二阶段，由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量传入，影响的日益扩大，“科学化”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始形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等亦初步形成。1939—1949年为第三阶段，其显著的两个特点是：史学理论学科内部体系的重新定位和探索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国化。作者又借鉴学术界关于史学理论学科可以区分为“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两大层面的看法，将近代几十年间学者们探讨的复杂问题，专设第二、第三两章，分别论述“近代史家对一般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近代史家对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其论述的方法则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以收纲举目张之效。第二章选择了史学理论中历史解释与史料考证关系的探讨、史学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探讨等，第三章则主要选择了历史理论中历史进程问题的探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探讨的梳理，发现近代学人在此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理论争论亦对近代史学的发展、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三是凸显近代史学理论演进的时代特征，力求揭示其发展趋势中所包含的启示意义。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出现热潮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端和形成的，为此，书中专设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与传播”一章，其中着重探讨的问题有：“西方历史观的吸收和发挥与不同流派的特色”、“西方史学理论的阐发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作者又总结到，在“五四”前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学科这一形成阶段，不仅具有“大量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这一时代特色，而且“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继承、阐释和再创造”，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对

于这一特点以往却一直被忽视。因而作者深有寓意地再专设一章，重点论述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阐发，其中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等方面的总结与研究”、“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与研究”、“对传统考据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扬”等项。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是本书着力阐发的又一重点问题，作者在其设立的末章中展开了内容颇为丰富的论述，尤其着重探讨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功绩：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大意义；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特征及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全国范围内史学指导思想的内在学理逻辑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方面，尤其显示出作者将本课题的研究与总结出对当前史学发展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使本书的撰著有更高的立意，增强其研究成果的前沿性价值。

总之，本书是作者花费大量心血著成的，以上讲到的仅是本书创获之荦荦大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书中发现更多的有创新意义的思考。叶建博士毕业之后在高校任教，由于平时用功读书、勤于积累，因而其授课颇受学生欢迎。但他也一再感慨：当教师后忙于上课，读书时间少了。因此他在得到所在单位大力支持下，又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访问学者。这种力求进取的精神是极可嘉许的。相信叶建博士在今后将更加以“潜心学术、力求创新”来勉励自己，以求在学术上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势	(1)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1)
一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萌芽及初步探索(1902—1915 年)	(1)
(一)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萌发	(2)
(二)近代史学理论早期探索的几个特点	(6)
二 “科学化”史学理论的形成(1916—1939 年)	(9)
(一)实证主义理论与近代史学理论的科学化	(10)
(二)几种中国化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3)
三 近代史学理论探讨的新变化(1939—1949 年)	(18)
(一)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定位	(19)
(二)近代史学理论中国化步伐的加速	(22)
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分析	(25)
一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涉及的主要内容	(25)
(一)关于一般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	(26)
(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探讨	(27)
(三)关于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探讨	(28)
(四)关于一般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30)
二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特点分析	(31)
(一)在学术发展与现实关怀的互动中求发展	(31)
(二)重视在继承中外理论成果基础上的创新	(33)
(三)在内容完整与一家之言互动中求发展	(36)
第三节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与历史研究的互动	(38)
一 史学理论建设对具体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38)

(一) 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出现	(38)
(二) 史料范围及价值的视野转变	(39)
(三) 历史研究方法的变更	(40)
二 具体历史研究对理论学科的实践和推进	(42)
(一) 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内涵的不断深化	(42)
(二) 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新认识	(46)
第二章 近代史家对一般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	(52)
第一节 一般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概况	(52)
一 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三个阶段	(52)
(一) 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及初步探讨(1902—1929 年)	(52)
(二) 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化(1929—1939 年)	(54)
(三) 史学理论探讨的新发展(1940—1949 年)	(57)
二 几种史学流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58)
(一) 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主张	(58)
(二) 新生机主义的史学理论	(61)
(三)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主张	(65)
第二节 对史学理论根本问题的探讨	(70)
一 历史解释与史料考证关系问题的探讨	(70)
(一) 偏重史料考证而漠视历史解释主张的提出	(71)
(二) 强调历史解释以纠正单纯重视史料之偏	(75)
(三) 历史解释与史料考证二者辩证关系认识的明晰 与深入	(78)
二 史学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的探讨	(82)
(一) 强调客观实证而排斥传统资鉴观点的提出	(82)
(二) 为史学致用观念注入新的内涵	(86)
(三) 对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新阐释	(90)
第三节 对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的探讨	(96)
一 新旧史学关系问题的探讨	(96)
(一) 新旧史学关系的提出及初步探讨	(96)
(二) 新旧史学关系问题探讨的深化	(99)
(三) 新旧史学关系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化	(101)

(四) 对新旧史学关系问题的新认识	(104)
(五) 新旧史学关系问题探讨的特点	(106)
二 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的探讨	(108)
(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的初步探讨	(108)
(二) 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探讨的深化	(110)
(三) 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探讨的新发展	(115)
 第三章 近代史家对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120)
第一节 关于历史进程问题的探讨	(120)
一 关于历史发展问题探讨的概述	(120)
二 关于历史进程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123)
(一) 历史重演问题的探讨	(124)
(二) 关于历史进化问题的探讨	(126)
(三) 质变与量变关系问题的探讨	(129)
第二节 关于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探讨	(131)
第三节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	(138)
一 历史动力学说的性质及分类问题的探讨	(138)
二 社会生产力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的形成及发展	(140)
三 社会综合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143)
第四节 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探讨	(146)
 第四章 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与传播	(151)
第一节 西方历史观的吸收和发挥与不同流派的特色	(151)
一 战国策派与文化形态史观	(153)
(一) 文化形态学说因素的继承	(154)
(二) 文化形态学说继承中的变异	(159)
二 朱谦之与生机主义史观	(164)
(一) 对历史哲学学科相关范畴的初步探索	(165)
(二) 对于历史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	(167)
三 潘光旦与“人文史观”	(170)
(一) 文化发展与人才消长	(171)
(二) 文化选择与民族复兴	(174)

四	各种历史观的相互关系及发展	(176)
(一)	不同的历史观并存与发展	(176)
(二)	不同史观的辩难与史学的发展	(179)
(三)	主导史观的出现及内容的变化	(182)
第二节	西方史学理论的阐发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	(186)
一	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介绍与传播	(186)
(一)	外国译著中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介绍	(186)
(二)	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介绍	(189)
(三)	对西方史料考证方法的介绍	(191)
二	对分析历史哲学的介绍与传播	(194)
(一)	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早期传播	(194)
(二)	分析历史哲学传播的深化与转型	(196)
三	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分析历史哲学的碰撞与交流	(199)
四	学术价值及时代意义	(203)
第五章	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阐发	(206)
第一节	关于史书体裁、史例等方面的总结与研究	(206)
一	史书体裁、体例的探讨概况	(206)
二	主要史书体裁的分析和总结	(209)
三	对通史体裁的继承和发扬	(216)
第二节	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与研究	(223)
一	对刘知幾史学思想的分析与研究	(223)
二	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阐发和研究	(231)
(一)	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231)
(二)	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几种主要倾向	(234)
(三)	小结	(241)
第三节	对传统考据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扬	(243)
一	传统考据精神和方法的评估与总结	(243)
二	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248)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在斗争中的成长	(25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开创	(254)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传播	(255)
二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奠基	(256)
(一) 关于历史观问题的探讨	(257)
(二) 关于史学观问题的论述	(258)
三 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初步探索	(26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发展	(265)
一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	(265)
二 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271)
(一) 何干之对论战的总结和反思	(271)
(二) 翦伯赞与《历史哲学教程》	(27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278)
一 对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	(278)
(一) 对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批判	(278)
(二) 对战国策派学说的批判	(284)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	(288)
(一) 对传统史学理论的总结与继承	(288)
(二) 对史学方法的重新探讨	(292)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学术理路	(296)
一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客观要求	(296)
(一) 史料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运用	(297)
(二) 史料考证与历史解释的必然联系	(299)
(三) 经世致用的时代要求	(302)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独特价值与指导地位的形成	(305)
(一) 应时代要求与深刻的理论力量	(306)
(二) 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与学术创新	(309)
 第七章 结语	 (314)
 参考文献	 (320)
一 基本文献	(320)
二 近人今人著作	(324)
三 民国期刊	(327)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势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近代史学理论不仅自身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和提升，而且还对中国具体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短短的五十年左右，它经历了萌芽、初步探索、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等阶段。

一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萌芽及初步探索（1902—1915 年）

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这标志着近代新史学思潮的出现。之后，近代史学理论文章不断涌现。它们着重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积极规划近代史学的发展，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新史学思潮。换言之，近代史学理论的萌芽及初步探讨是与 20 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同步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萌芽阶段的下限是 1915 年，这是为何呢？辛亥革命结束后，近代史学理论的初步探讨随之进入了短暂的沉寂时期，其间发表的史学理论文章主要是沿袭了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而无创新，并且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迥然不同的。

(一)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萌发

明代晚期,西学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国内,到清乾隆年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人为地中断了这一进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再度开始睁眼看世界;至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的行程先后经历了器物、典章制度及思想文化三个层次,这对中国社会及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近代历史学建设而言,也正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西学东渐,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产生。

19世纪末,影响近代史学理论形成的西学首先要数达尔文的进化论。1895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并在天津《直报》上以《天演论》的基本观点为立论依据,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四篇文章。1898年,严复又出版了《天演论》。几乎同时,康有为在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并以此成功改造了公羊学说中的三世说,这一方面为进化论在国内的传播消解了当时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情绪,同时也成功地构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些著述出版之际,正是民族危机非常严重,举国上下有识分子思变图强的时刻。进化论学说有力地冲击和批判了循环史观、复古史观和天命史观这些长期占据古代学人头脑的学说,进而为近代史学理论的建设廓清了历史观上的认识误区。

1902年,梁启超提出“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①。即客观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向前的发展。如果要探索客观历史的真相,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这一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重点批判了孟子的循环史观,认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页。

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①。这里，梁启超是把孟子个人的循环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观的主流，因此也就很自然推论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②的结论。可见，梁启超认为古代史学理论向近代史学理论的转型，必须从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转变开始。

梁启超这一主张得到了当时很多学人的赞同和支持。1902年8月，邓实赞同梁启超援引进化论思想入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做法，认为“闻之新史氏矣，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③。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邓氏与梁启超一样，认为进化论学说是近代史学理论的精髓。又如1902年12月，汪荣宝为史学下的定义是：“史学者，研究社会之分子之动作之发展之科学也。”这里的发展，“谓之物本其内部所含之力自伸自炼而生种种之变态者也。历史上所谓沿革变迁、推移等种种之名词，皆示其发展之一端而已”^④。这里所谓的发展，其意思实则与梁启超所说的“进化”大体相近，即强调史学研究是探求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此外，吴渊民、曹佐熙等人在对历史学定义的阐述中都运用了进化或与进化意思类似的名词。^⑤换言之，他们都是主张史学研究应以进化史观为指导。

如果说仅凭进化史观直接催发了近代史学理论的萌芽，这是不切实际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页。

② 同上。

③ 邓实：《史学通论一》，《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二，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714页。

④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2卷第9期，1902年12月。

⑤ 这些论述主要是：吴渊民的“历史者即叙述时间之现象之进化之状态者也”（《学报》第1期，1907年2月）；吕瑞廷、赵激璧的“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社会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凡道德智慧之进化，农工商业之发达，治术学术之进步，皆属历史之范围”（《新体中国历史》“叙论”，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曹佐熙的“纪人群演进之次第而阐其原理，立为公例，以示见在，以示未来者谓之史。史所著谓之书”及“史之内容有三，一曰事（人群演进之次第谓之事），二曰义（人群演进之原理公例谓之义），三曰文（记而阐之，立而示之者谓之文）”。（《史学通论》“史学之经纬”，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9年）。

的。20世纪初,欧洲、日本的文明史学与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输入,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近代史学理论的产生。

西方文明史学方面的著述,如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据《译书汇编》“广告”称“已译待印”^①,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自1903年起开始有学人译为中文,并有四种译本之多。^②日本学人的文明史学著作也被译成汉文在国内出版,中西牛郎《支那文明史论》(1902年普通学书室编译)、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即《支那开化小史》,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刘陶译)、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译)等便是。除这些译著外,其他欧洲或日本的相关文明史学方面著述亦为当时学人广泛地引用,如邓实在论述民史概念时,引述了加藤弘之的观点作为佐证,“夫民史之所有者何,则一群之进退也,一国之文野也,一种之存灭也,一社会之沿革也,一世界之变迁也。日儒加藤弘之曰:‘究论人群之事之学即史学也,史学者所以详究人群之兴亡盛衰隆替荣枯之天则者也。’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③。至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主要是通过编译日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和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获得的。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史学理论文章中,汪荣宝的《史学概论》主要以介绍《史学研究法》为主,无名氏《史学之根本条件》(《汉声》第6、7—8期,1903年)和张玉涛《史学研究法》(《学报》第6、7号,1907年)亦是翻译了《史学研究法》的部分章节。然而介绍实证主义史学理论最为系统的要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译本的出版。该书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历史学的特质及其范围、史学研究法、史学与地理等理论问题,而且在1902—1903年有

① 《广告》,《译书汇编》1900年第2期。

② 这四种译本分别是:一、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该书虽号称《英国文明史》,但实则只是译刊了原书第一卷“概论”部分第五章;二、《学报官报》译刊的,书名亦为《文明史》,但实际上也只有原著第一卷第一、二章和第三章开头一部分;三、见于《政艺通报》1903年4月第15号“广告”,书名为《文明史论》,但该书是否出版未知;四、见于作新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留学报告》中的“留学生著述”部分,据称有番禺王建祖译的《英国文明史》。详情参看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③ 邓实:《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二,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717—718页。

五六种译本，堪称史学界的一次盛况。^①

但须指出的是，这三股学说在20世纪初史学理论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进化史观主要为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历史观，史学界据此打破了循环史观和复古史观的束缚，用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看待历史及史学本身的发展；文明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输入，则为近代史学理论建设学科提供了一种参照物，学人可以从中得到理论依据和材料佐证。同时，这三股学说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进化史观在近代史学理论是起历史观导向作用的，文明史学则主要是提供人种、地理等新领域，而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则是具有介绍历史学一般概念范畴的价值。为何这样说呢？20世纪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史学理论问题的相关论述几乎都以救亡爱国为宗旨，史学的致用功能被突出强调，进化史观和文明史学蕴涵的文明发展进化论、竞争动力论等因素被学人广泛地应用；而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则往往受到冷落。在当时，除汪荣宝的《史学概论》、曹佐熙的《史学通论》外，国人撰写的介绍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理论著述几乎没有，甚至就是梁启超《新史学》这一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在摘抄和介绍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时，对其“史学研究法”一章介绍史料搜集、考证和历史解释的原则等内容亦一字未取。因此，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挥作用，但在此时的传播只能说是有其萌芽而没有发挥主导作用。

总之，在西学东渐思潮中，近代学人有意识地介绍西方和日本在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了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汪荣宝的《史学概论》、邓实的《史学通论》、马叙伦的《史学总论》、吴渊民的《史学通义》、蛤笑的《史学刍论》、王葆心的《历史研究法》等

^① 据俞旦初指出《史学通论》存在六种译本，分别是：一、《新史学》，侯士绶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二、《史学通论》，李浩生译（杭州合众译书局1903年版）；三、《史学通论》，罗大维译（进化译社1903年版）；四、《史学原论》，刘崇杰译，见于《西力东侵史》（1903年2月）附录“闽学会丛书”广告；五、《史学原论》，杨毓麟译，见于《游学译编》第4期（1903年2月）“新书广告”；六、《史学原论》，东新译社通人编译，见于《游学译编》第1期（1902年11月）“译书广告”（详情参看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但据郭国义考证，俞旦初所指的六种译本，有一种误收，实则第五和第六为同一本，另外新增《北洋学报》删改节略刘崇杰《史学原论》的本子。大致亦包括五六种译本（郭国义：《〈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代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